

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实践与探索丛书

丛书主编 / 王成军

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  
史学观念之异同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  
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王成军 / 著

 科学出版社

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实践与探索丛书

丛书主编 / 王成军

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  
史学观念之异同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  
传记史学观念之比

王成军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 王成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6

(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实践与探索丛书)

ISBN 978-7-03-047015-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传记—史学观—研究 ②普鲁塔克, C. (46~125)—传记—史学观—研究 IV. ①K204.2②K835.4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8473号

责任编辑：陈亮 任晓刚 / 责任校对：李影

责任印制：张倩 /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敬

编辑部电话：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6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字数：440 000

定价：9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丛书总序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魅力无穷。这样作不仅可以为认识中国历史提供蓝本和参照，在阐释某些疑难现象时获得灵感和启发，更重要的是，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定准坐标，判明是非，剥离假象，找到方向。因此，中西史学比较不单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学理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为西北学术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朱本源先生曾长期执教于此。他不仅著有专书，对史学比较在理论上作过系统分析和归纳，而且非常善于用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在西周社会性质等热点问题上发表过重要文章，其见解之独到，早为世所公认，这又在实践层面为我们树立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典范。如今，朱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近些年来，一批青年才俊先后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老大哥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西安任职，既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带来了重理论、重融通的学术风尚，陕西师范大学由朱先生开创的史学比较老传统后继有人。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一向对西部地区关爱有加、大力扶持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建议我们成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心，得到了学校的批准，并拟定就聘刘先生作主任，但他坚辞不就，只答应以名誉主任的身份作坚强后盾，而把我和他的弟子王成军教授推到前台。刘先生的设想是以中心为平台，团聚队伍，凝炼方向，形成特色，扩大影响。作为具体措施，则有招收研究生、在中西比较的总体框架下相对集中确定科研选题、编辑出版丛书等。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2012年中心正式挂牌时，刘先生不顾年高体弱，亲临西安，向全院师生阐扬中西比较的意义，又分头与相关年轻教师谈话，用耳提面命的方式循循善诱。2013年招收的中西史学比较方向的博士生也在王成军教授的带领下去北京，向刘先生当面问安和请益。

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2012年至今，转眼三年有余，朱、刘诸先生播撒的种子初见收获，我们将已杀青的书稿编在一起，算作丛书的第一辑。从内容上看，既涉及具体历史事件，也涉及中西早期社会规范、发展道路、史学观念、哲学思想的异与同。我们深知，刚刚摸着门径的作者还远不能得心应手，加之从专业背景看，中心成员又以教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居多，对于世界历史还有一个重新再学习的过程，所以，这第一批成果并不光鲜甜美，甚至有些青涩，与其说是比较研究，不如说是仅仅有了一点比较意识。但驽马十驾，不舍千里，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刘先生为中心设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并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我们诚挚欢迎史学界对丛书提出批评，并对为丛书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院领导和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深表谢忱。

赵世超

2015年11月10日




# 目 录

丛书总序 .....	i
绪 言 .....	1
 一、论题的缘由和意义 .....	1
 二、学术史 .....	8
 三、主要内容 .....	10
 四、方法论 .....	13
 五、着力点和不足之处 .....	22
 六、结 语 .....	24
第一章 中西原始文化的结构及其特征 .....	25
 一、中西早期的文化结构及其特征 .....	26
 二、中西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对史学影响之比较 .....	54
 小 结 .....	78
第二章 中西早期文化结构不同的历史原因 .....	81
 一、中华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成因 .....	82
 二、古希腊文明建构的内容及其原因 .....	114
 三、中西不同文化结构成因的深层次比较 .....	129
 小 结 .....	139

第三章	早期文化的理性化进程与中西传记史学的 关联 .....	145
	一、中国的传说传统与传记史学的产生 .....	145
	二、古希腊的自然神话与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 .....	167
	三、双方异同之比较 .....	192
	小 结 .....	204
第四章	中西史学进一步发展的硕果——传记史学 观念的产生 .....	211
	一、中国传记史学的产生 .....	211
	二、古希腊与罗马传记史学的产生 .....	233
	三、中西传记史学产生之比较 .....	257
	小 结 .....	269
第五章	中西古代史传的结构及其特点 .....	274
	一、中国早期传记的结构和特征 .....	274
	二、古希腊罗马传记的叙述特征和结构 .....	296
	三、中西传记本质特征的共性与不同性之比较 .....	312
	小 结 .....	329
第六章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价值观的异同—— 求真与求善的冲突与统一 .....	333
	一、司马迁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特征 .....	334
	二、真与善的两难抉择——普鲁塔克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特征 .....	356
	三、价值观之比较——求真与求善的冲突与统一 .....	377
	小 结 .....	389
第七章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	392
	一、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历史逻辑和突出特征 .....	392



	二、司马迁与普鲁塔历史成就的原因及其深远的影响·····	397
	三、结语——文化人类学理论与中西早期文化研究的旨趣·····	403
	参考文献·····	410
	后 记·····	417



# 绪 言

## 一、论题的缘由和意义

本书稿是我原先承担的国家项目《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研究》前半部分内容，也是在我原先出版的《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一步深化的产物，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能出版我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家项目结项稿中的一部分心得，而其他部分内容，有待于它日，在继续修订的基础上再择机出版了。

### （一）选题的缘由

就本论题而言，对中西传记史学所赖以产生的文化结构，尤其是对传记史学的异与同的考察则是对比研究的重点。显然，本论题从内容上言包括两个重点，一个是文化结构，另一个则是两大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同与异。对文化结构的理解成为本论题的基本出发点。

#### 1. 文化与文化结构

这一问题包括以下三个小问题：

其一，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难题，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人们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有数百种之多。事实上这也构成了我们进行中西早期文化比较的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英国学者，人称“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其《原始文化》（1871年版）名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广

泛的复合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sup>①</sup> 泰勒的这种文化定义直到今天仍有其经典性。显然，泰勒的文化概念其实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了广义的文化，又包括了狭义的文化。从广义方面言，人类从长期经验中所创造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内容；从狭义方面言，文化是指学术思想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及其成就。由此可见，文化从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分别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性两个方面，从而使文化在显示了其所具有包容性的同时，又显示出其所具有的突出的成就性另一面，既从文化的复杂的内涵抽象出来，又便于对人类的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比较探讨。以此为据的话，具体于本论题而言，中西也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在进行中西早期文化比较时，本专题在广义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突出狭义的文化比较内容，其目的在于凸显中西两大文化结构的各自特征和发展的趋向。

其二，什么是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是从近代以来在对文化的长期研究中所形成的重要的学术成果。它强调的是文化要素之间所建立的相互关联的一种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相互依赖而产生的稳定性，也有由于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的变化关系。就是从文化的结构这一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具体的文化现象，而不只是从某一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其自身加以感知。因此，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充分地认识到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有机的统一体。

以此为据的话，我们可以借助分析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一些归纳，从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构，便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探讨。如果从文化地域来讲的话，对文化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多个结构类型，其中中西为世界文化中的两大结构，比如，中西的文化结构就表现为两大文化类型，并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的文化结构，并由此而决定了中西文化的品格和内容。

其三，文化结构的重要作用是什么？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其目的是

<sup>①</sup>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为了彰显文化结构对文化的特点和品质所具有的重大的作用。“文化是大写的人格。”这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文化模式》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强调了文化对于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作用。其实，文化结构也正是如此，它不仅对于生活在文化结构中的人的性格和思想及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塑形作用，而且对于其结构中的文化要素也发挥着重要的塑形作用。以此来看的话，存在于文化结构中的某一文化的特征自然与其整体的文化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果从文化的类型和结构来分析某一文化的核心、特征及用途的话，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研究途径。刘家和先生曾深刻指出：“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最初大抵都从无所不包的宗教神话里逐渐分化而来，而史学又是在文化发展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当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各文明古国的发展情况又各有特点。”<sup>①</sup>其实，对于本研究课题而言，即从中西文化结构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传记史学的发展及其趋向也是如此。

## 2. 中西早期两大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同与异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我们常常把司马迁的杰作《史记》称为纪传体史学。从现存资料来判断，司马迁不仅是中国传记史学的创始人，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因为在他以前，我们还不能找到任何一篇可以真正称得上“传记”（biography）的作品。但仅是如此，还不足以深刻认识司马迁及其《史记》所应有的历史地位。

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在世界史学的园地里，中国古典史学无疑是一朵自有异彩的奇葩。要阐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史学已经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置我国古典史学于不顾。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我国古典史学对于后世以至当代史学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人们意识或不曾意识到的影响。因此，要发展我们当前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以求对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不能不对中国古典史学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反省。这种反省既可以结合纵向的前后历史阶段的比较来做，也可以结合横向的与外国古代史学的比较来进行。”<sup>②</sup>刘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指出了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

<sup>①</sup> 刘家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学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第71本，第3分册，2009年9月；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sup>②</sup> 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中西史学比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只有突破《史记》研究所固有的时空局限，将《史记》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同西方当时最发达的希腊罗马史学相比较，才能真正感受到《史记》所包藏的史学价值，才能对东西方古典史学的内在特质有更深刻的了解。

这样，为了使这种比较具有意义，我们选择了能够充分表现传记史学特点的集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于一身的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传记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Plutarch)是生活于罗马帝国繁荣时代的罗马文坛的巨擘。他生于希腊中部的军事要塞维奥蒂亚的喀罗尼亚，从小家境富裕，曾到雅典学习修辞、数学、哲学；并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担任祭司。他曾广游地中海地区，并到罗马讲学，结识不少罗马权贵。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喀罗尼亚度过，曾被哈德良帝任命为资深长官。

普鲁塔克终生勤奋，学识渊博，思想内容丰富复杂，是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传记史学家，著有一部包括50篇传记的传记集传世。普鲁塔克的这个集子，原文为希腊文，名为《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Parallel Lives of Grecians and Romans)，以下按人们的习惯，将其简称为《名人传》，对罗马及西方后来的传记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名人传》一般采取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对举的方式，以叙述传主的不同表现，最后再用《合论》的方式详细比较两者在各个方面的不同点。现存的《名人传》共有50个传记人物，时间跨度上下约千年，地跨希腊与罗马。在书中，普鲁塔克以古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认真细致地汇集、描述了有关希腊罗马名人许多已失散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翔实文献资料和难得的传说轶闻。由此出发，《名人传》既是希腊罗马名人本身丰富多彩的精神风貌的写照，又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上下千年的希腊罗马历史的发展变化轨迹，而且从普鲁塔克的传记叙述中，也可以感受到罗马帝国时期人们的传记观念和当时社会历史的特色，因而《名人传》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史学著作，对后世的西方史学，特别是传记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古希腊罗马传记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里程碑。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名人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专著，它带有非常明显的文学色彩，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诘难。但

在我们看来，就对传记历史意识的认识来说，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思想已经相当成熟，成为古代西方难以逾越的样本。

所以，作为中西古典时代的二位传记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成就人所公认，因而对他们两人传记史学的比较就显得极其有意义：从历史时代而言，司马迁较之于普鲁塔克早将近 200 年，司马迁是雄踞于东方的当时世界四大帝国（汉帝国、古印度的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之一的西汉帝国的著名传记史学家，普鲁塔克则是挺立于西方的同样是当时世界四大帝国之一的罗马帝国的传记史学家，所以从两者的传记史学比较中可以看到双方丰富而深刻的传记史学观念和中西社会历史内容；再从两人的思想内容来看，司马迁不仅仅是著名的传记史学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史记》是涵盖长达近 3000 年历史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同样，《名人传》也不是普鲁塔克的全部文化成就，在《名人传》的背后还有其坚实的道德思想基础的载体——《道德集》，因此，对两人的传记史学观念的比较不仅可以反映出中西两大史学、传记史学流派的相同和相异的史学特色，还可以从中反映出中西两大文化流派的思想文化特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课题的研究特点在于将两人的传记史学思想置于中西早期的文化结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从中西早期文化结构的形成、内容和特点这一角度来探讨中西传记史学产生的原因、内容、特征及趋向，而以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为典型事例，来探讨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间，与两大史学家传记史学观念之间的内在的有机关联，以大见小，并从小中再见大，以展现中西早期传记史学的源远流长且丰富多彩的传记史学内容。这一研究不但会使人们对中西早期文化结构的内容和作用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将会使人们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理解更为深刻而全面。

## （二）研究的意义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碰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在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比较中将处于东西两大帝国的两大传记史学家联系起来，如何将古今间距 2000 多年的传记史学观念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易解决。因而，本项研究的首要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解决了对于存

在着巨大时空间距的中西传记史学观念进行比较的可能性问题，并由此突显了进行此类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意义及理论意义。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曾这样讲过：“凡是历史事实都属于一特定时空，它身处于它的时代而与其他事件、现象相牵连；受它们或近或远的牵制，或受它们的提携、阻抑，而共同塑造它们的时代。这些相互影响的关联必须加以掌握；这些关联的广度与深度都必须加以认识，这是条件的解释。”<sup>①</sup>显然，对这种客观的似乎并不联系的历史条件进行探索，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正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对中西古典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进行比较的历史条件和所要进行比较的历史性内容。归结为一句话，如何使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两人进行传记史学比较的客观性内容转化为可能性，并由可能性进一步转变为现实性，这是本课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比较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论述古典文明史与现代文明史的内在关系时曾精辟指出：“如果以狭隘的实用眼光来看，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内容从时、空两方面说都很遥远；如果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来看，它又在眼前。”<sup>②</sup>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指出了中西史学比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中西史学比较领域之中的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比较提供了比较的可能性，而且对于我们具体进行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本研究对于深入揭示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因为中西古典史学是世界史学史上两个同时发生的最为发达和典型的史学形态，而传记史学则是其各自史学花园中绽放的璀璨的花朵之一。司马迁和普鲁塔克各自以其代表作《史记》和《希腊罗马名人传》分别成为中西“古典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并因其传记史学的杰出成就而铭刻于中西史学史的长廊中，并名垂后世，成为中西传记史学史中最杰出的史学家。虽中西古典时代音讯未通，文化发展轨道各异，但中西古典时代各呈异彩的发

<sup>①</sup> 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sup>②</sup>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达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中西古典文明都具有的与现代意识紧密相关联的文化特征却将两者在对立中又统一了起来。因此，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探讨二者的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的同与异，而从中西早期文化结构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对于深入探讨中西传记史学的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本研究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当代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不可讳言，本课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目的意识，因为本人申报这一课题的初衷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途径，即试图将中国古典时代的传记史学在同古希腊的发达的史学特别是传记史学进行比较时，汲取古希腊传记史学的营养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史学，特别是本课题所关注的传记史学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得中国古老的传记史学在新的时代，在和西方传记史学的交融中，得到新启发，获得新发展。

从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件的连锁中，形成主要的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sup>①</sup>说的就是一切的历史性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现代性，而其更深的学理则在于它彰显了古今一体的史学观念。借用西方著名的历史理论家、意大利人克罗齐在其《历史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格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3) 本研究将在现代史学观念和理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充实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成果，为探索中西传记史学发展的趋向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在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对此，西

<sup>①</sup>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6页。

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sup>①</sup>。

不言而喻，中西古代关山相阻，万里之遥，中西史学的产生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中西传记史学的轨迹也由来有自，其成就也各呈异彩，而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两大史学家相互未曾耳闻，不曾相知，两人的史学成果更是天马行空，各逞英豪。因此，对课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以中西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同时也需要有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尽管在此之前，中西史学界曾分别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二人进行过不同主题和视角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时代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历史研究绝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试图从现代的史学观念和理论的视角，对中西传记史学进行新的、富有深度的研究，揭示出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更为丰富的内涵，从而使我们对中西传记史学观念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并进而为探索中西传记史学发展的趋向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 二、学术史

这一部著作是在前期研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成果基础上，对这一课题的一些问题从中西文化结构上进一步探讨、比较研究的成果，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状态和历史本人在《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的绪言中都已论述了，在此只是强调一下从中西文化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异同的历史合理性和重要性。

其一，从整体的文化结构上对二位传记史学家进行研究是学术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从中西史学史来看，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但从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来看，早期研究者都侧重于对两位名家和两部名著几乎所有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考订和批判，但其弱点则是没有能够在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其整体的思想观念进行更为宏观且有深度的把握。但前

<sup>①</sup> 朱本源：《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两者的思想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从近现代以来，人们正是在前辈学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索、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而重要的思想观念，侧重于从宏观上把握两者的史学思想观念，努力将历史与理论、理论与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讲，这一思路是现代学者研究司马迁和普鲁塔克思想观念的基本趋向。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方法并不是现代学者的全新创造，而是在继承前人，特别是在继承司马迁创作《史记》时所运用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行之有效的的重要方法。因而在此所要强调的是，现代学界所倡导的这一整体思维方法，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异同这一论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二，从文化结构上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是深化这一专题的必由之路。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传记观念具有跨学科的突出特点，既涵盖历史，也关乎文学、哲学，等等。他们的这些成果表现在多个学术研究领域之中，究其原因在于中西古典时代，学科尚无严格分类，因此二者的著作不仅具有上述的一些性质，而且还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包罗万象，自成一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名人传》是普鲁塔克最有名的作品，历来被称为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并被公认为是一部融历史、文学和人生哲学于一炉的鸿篇巨制。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名人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专著，它带有非常明显的文学色彩，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诘难。《史记》研究史同样表明，人们之所以对《史记》的有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探讨其中的问题时，所选取的角度和方法论不尽一致，对于我们现代《史记》研究者而言，所应坚持的正确理解方式就是取法于司马迁，将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将历史局部和历史整体相统一。唯有如此，才能在《史记》的研究中，始终对此特殊而具体的研究对象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所采取的方式仅仅是从一隅出发的话，必然会有盲人摸象之误，因此，从整体的文化结构上进行研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研究方式。

其三，学界对中西学术观念的比较都不同程度地必然地与中西的文化或中西的历史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本研究符合这种学术趋向。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异同成为学界长期探讨的重要话题，而对中西的带有某些比较性质的研究也有百年左右的时间了，出现了许